

【编者按】欧阳发同志年逾八旬，曾在安徽省、市两级党委机关，省地方志办公室、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省级媒体等多个单位多个岗位工作，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力和丰富的领导经验。他编纂了大量各层级各行业的志书，可以说是新中国方志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金秋时节，身为中国地方志协会副秘书长的欧阳发同志，执笔撰写关于地方志编修情况的专题报告，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为此，国务院发布了专门文件，直接促成了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的召开，推动了地方志事业的繁荣发展。欧阳发同志从省政协副巡视员岗位退休之后的20多年中，没有停下追求地方志事业的步伐，一直秉承“以修志为乐，以修志为荣”的理念，老骥伏枥，孜孜以求，在地方志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道路上，实现厚重而闪光的人生价值。

往事回味

欧阳发

溯自上世纪80年代初，迄今40余载，中间经历了许多往事，无不与地方志编纂和研究相关联，因系亲身经历，耳闻目睹，懂懂往来心中，久久不能离去。近日闲来无事，遣笔记之，回味其中甘苦，一乐也。

——题记

初踏志界

1981年1月29日，《安徽日报》刊发了我撰写的一篇言论，题为《建议编修安徽地方志》。同年7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宣布成立。11月，安徽省委决定成立省志办，大概是因为先前刊发的那篇言论造成的印象，我自然成了省志办工作人中的不二人选。1982年3月，我从省委办公厅调入省志办，负责资料征集和业务指导。7月，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第二次（扩大）常务理事会议，安徽是赵文衡同志和我参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活动。

会议由曾三、梁寒冰、朱士嘉主持，与会者30多人，其中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的史志名家。会议讨论十分热烈，使我大开眼界。在讨论省、市、县参考篇目时，受会议热烈气氛的感染，我按捺不住激情，便写了一张小纸条，递给了协会副秘书长周雷，询问列席代表可否发言？周雷说：“可以，你说吧！”我对参考篇目中的“民主革命纪略”和“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纪略”两个类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国史、党史、地方志三者之间应有个分工，地方志不可替代党史编纂，地方志应侧重于地方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人文掌故、经济发展等，虽说编修方志势必涉及民主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只需记述本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即可，不必独设门类，建议取消这两个“纪略”。若保留，必然是集中排列大量事实，客观上形成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而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展政治运动则存在许多失误，掌握不好易授人口实。我的发言引起梁寒冰会长的特别关注，后来在新

改的参考篇目中取消了“民主革命纪略”和“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纪略”。可能是专家们另有考量，或许是我的发言发挥了作用，为此，我深受鼓舞。从此，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记住了我的名字。

1983年4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北京举行会议，隆重宣布成立。这是中央批准恢复地方志小组活动并改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以下简称中指组），中指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其日常工作由中国地方史志协会负责。由于地方志编纂在我国已中断多年，好几代人都没有修过方志了，对于如何编纂志书普遍不是十分清楚，尤其是采用何种体例众说纷纭。因此，此时史志协会开会、培训大多是以研究方志体例为中心议题。

80年代初，全国地方志工作发展不平衡，开展早的、进展快的已经成书，开展慢的还停留在组织队伍、培训干部阶段。为了弄清志书体例，我把全国已经编印的新志书和评议稿与传统志书进行了反复比较，发现新志在体例上问题很多，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三大块”，即先分期、后分类，把一部志书分为古代、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三大部分，如新编《呼玛县志》；一种是“三小块”，即先分门类，在门类之下再分古代、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编写，实际是横剖未尽，如新编《台安县志》；另有一种是腰斩一刀，全书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分界线，分为截然有别的上下两大篇。只有新编《如东县志》横剖8个门类，较好地继承了传统志书的体例。志所以称之为志是因为它的体例所决定的，如果新方志体例还没弄清楚，志书就已经出版，各行其事，这是十分危险的。我对志书体例有所认识和敏感，这要感谢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70年代后期该台开办了“古代作家与安徽”专栏，每周一稿，播送两次，我被聘为专栏作者。为了寻找古代作家在安徽活动的踪迹，我几乎翻遍了省档案馆收藏的府、州、县志，看得多了，自然对志书体例格式有所认识。

骨鲠在喉，一吐为快。我利用出席全国城市志工作经验交流会机会，向副会长董一博说了我的上述认识。董老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会议结束后，再找几个省的同志去原平县开个小会，专门研究新志体例。参加原平会议的有山东、安徽、辽宁、山西四省修志人员，协会除董老还有人民大学的刘光禄先生。在讨论中，我讲了三个问题：一是何为体例，志体是由体裁、结构和章法构成。二是如何把握志体，分析了当前五花八门的志书形式，批评了“三大块”“三小块”“上下篇”等违例之举。三是体例的继承与创新，对新编《如东县志》的做法表示赞同。开始反应并不那么热烈，到了晚上，大家好像回过味来，纷纷走进我的房间与我作进一步的探讨。现在看来这些认识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在当初却似“一声炸雷”（邵长兴语）。会后，我将在原平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成《志体三议》，发表在《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3年第5期上。此文发表后，引起全国志界的热议，对于新方志体例的形成和统一认识起到了推动作用。

上书中央

1984年1月20—21日，中指组和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在北京召开旧志整理预备会议，会上会长梁寒冰宣布：根据工作需要，经协会领导人协商，决定增聘左开一、朱文尧、刘光禄、欧阳发为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秘书长。平时在原单位工作，协会有事召之即来。

当时指导小组的办公室也是史志协会办公地点，办公人员六七人，仅平房3间，行政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其地位不及一个研究所。接待工作更令人尴尬，有次到京开会，办公室有位领导推着自行车去火车站接我。有次进京，因找不着旅馆，夜晚只好睡在社科院驾驶班的桌子上过夜。各地志办来人，见中指组办公条件如此，无不感到出乎意外。这些与领导全国百万修志大军的指挥机构极不相称。董一博副会长多次与我议论办公条件和领导人员结构，发誓要改变这种

状况,并决定向中央写信如实报告。开始,董老把写信任务交给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结果写的不理想。之后,董老亲自执笔,写成了万言书,全文长达2万多字。我以为太长了,我说:我是当秘书出身的,给中央的报告文字一般不超过3000字,电文不超过1000字。若写得过长,很难送到日理万机的中央首长手中,如果是秘书摘报,也未必都能抓住要害。董老听到这么一说,便说:“你来写吧,北方片会议时带去。”

谈话后,我回到合肥,花了一个晚上时间,把信写好,用了1800字。在信上提出4条具体意见:第一,因势利导,要把全国修志当成一项重要文化建设来抓,要有一个副总理挂帅;第二,指导小组的隶属关系应恢复到“文革”前那样,划归国务院领导,以便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修志的格局;第三,切实帮助解决办公人员的必要编制、住房、活动经费及印刷事宜等;第四,以中央或国务院名义颁布《编修新方志条例》。10天后赶到北京交了卷,董老看了我起草的信比较满意。随后,我与董老一道去黑河市参加北方片会议。到了黑河,董老便召集王文举、刘乾昌、刘福钧、曹振武和我,在我的住地讨论了这封报告信,大家一致赞成。议论中有人提出最好请万里同志来抓方志工作,因为万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根据这个建议,我在信上加上万里副总理的名字。讨论结束后,我说刘乾昌字写得好,请他抄一遍吧,刘也答应了。信重抄后,交董老最后审定,而后由董老交刘福钧安排打印的。打印稿我看了一遍,原文未作更改,但在信的开头由董老亲自加了几句话,文曰:“博碌碌碌线,无所长短,惟每廛时忧,临渊是惧!是以不揣愚蒙对中国地方志工作,向你报告和请示。”当时,我为自己能圆满完成协会领导交办的任务而感到高兴,但这份报告信能否送到总书记手中,能否得以批示,心里没有底,反正是试试看。

从黑河归来,协会派董老和我去西安讲学,结果董老病了,留在北京,我只身一人前往西安。在西安,陕西志办安排讲一天休息游览一天,折腾了一个星期。回到合肥,一直与董老保持热线联系。有一天,董老告诉我,信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局长亲自安排送到胡耀邦总书记的办公桌上,总书记十分重视,亲自批示转给胡乔木,胡乔木批示后,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看来方志事业有希望啦!听此消息,激动不已。

不久,接到中指组开会通知,让我去北京列席中指组会议,讨论落实耀邦、乔木的批示。参加会议的有中指组领导成员、协会会长、副会长和正副秘书长。我是提前一天到达北京,因为董老尚未出院,我到安贞医院探视,见面后他格外高兴和激动,有一种说不出的胜利喜悦。他和我说了他的宏伟规划,要成立方志研究院,要办一张《中国方志报》,要办一个方志出版社……

在会上,我看到了中央领导人批示的影印件。胡耀邦总书记批示,地方志工作确要有一个敢抓敢闯的人牵头,并批示胡乔木同志阅,批转社会科学院领导同志办。日期为1984年8月20日。8月21日乔木将批件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梅益、马洪二位领导,并批示认真改变目前的状态,调集有志于此者全力以赴;遇有困难,请按范围分请国务院和各省市县负责解决。

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在全国方志界产生了巨大反响,不仅推动了地方志工作进展,亦改善了中指组办公室的办公条件,同时也把董老在方志界的影响推向了高峰。董老每次谈话或写信,谈及上书中央一事,总是说:欧阳子“功不可没”。其实,这封信是董老直接策划的,我只不过做了一点具体工作。时隔数年董老和梁公相继去世,在党中央、国务院关怀下,地方志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硕果累累。有人说,没有董老上书,就不会有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就不会有国务院33号文件,也不会有全国第一次方志工作会议。每当回忆此事时,我感到十分欣慰,当年参与给中央上书,这是我做了一件有利于方志事业的好事。

展现担当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因人事变动，特别是方志界重要领导人和有影响的专家，如曾三、梁寒冰、董一博、朱士嘉、傅振伦、李志敏、刘光禄等相继辞世，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的活动再也不比往常活跃，而此时全国普修方志亟待总结首轮修志的经验和探索二轮志书的编修。方志界有识之士莫不为此事发愁，特别是朱文尧同志心急如焚，他和我同是协会副秘书长，深感有劲使不上。我们利用信件、电话和一切见面的机会探讨怎么办？能不能站出来主动担事？能不能成立一个民间学术团体推它一把？最后选择成立华夏地方志研究所。

孰知在中国办个民间学术团体谈何容易，光是挂靠单位，联系了10多家，大伤脑筋，最后总算有了着落，把华夏地方志研究所挂在江汉大学。学术团体的生命在于活动，而活动又受制于经费。文尧同志满腔热情，多方奔走，四处筹措，筚路蓝缕，终于在1989年把华夏地方志研究所的牌子在武汉车站路2号高高挂起。文尧被推为研究所所长，我和几位志友担任副所长，还在全国各地聘了一批研究员。对于此举，方志界有人称赞，有人放出风凉话，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华夏地方志研究所成立后，直奔两大主题：一是总结首轮新志的编纂经验，检讨得失；二是探索续志（即二轮方志）的编写。研究所成立不久便于1990年9月23—29日在武汉举办了全国首次市县志编纂经验研讨会，会后编辑了《市县志编纂经验》（第一辑），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91年4月22—27日在武汉又举办了全国第二次市县志编纂经验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市县志编纂经验》（第二辑）。同年5月，举办了全国第三次市县志编纂经验研讨会，编辑出版了《市县志编纂经验》（第三辑）。1991年6—9月，华夏地方志研究所与广水市地方志办公室合作，对《应山县志》发行后社会效益展开调查。全国第四次市县志编纂经验研讨会于1994年举办。每期研讨会与会者全是市县主编和业务骨干，所以经验来自实践，丰富多彩，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没有自炫其学的空谈。这四期研讨会都是文尧同志不遗余力，一手操办，何等辛苦，何等付出，可以想象。这四次会，我都到会作了重点发言，文尧同志介绍我是方志界的“拚命三郎”，其实他自己才是一位不知疲倦、敢于担当的志坛干将。若干年后他被选为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

在总结一轮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如何编好二轮志书，修好续志，必须未雨绸缪。首轮修志大家深感理论准备不足，二轮修志总不能重复这个不足和遗憾。1996年10月，华夏地方志研究所举办了全国续志座谈会。会前，文尧同志亲拟调查提纲，发给与会者参考，并亲自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方志学者和方志工作者，会后由文尧同志主持把会议的发言选编成册，命名为《方志续修今议》，其中收录了林衍经的《新方志续修问题初探》、黄道立的《方志续修纵横谈》、欧阳发的《创修·续修·重修》、饶展雄的《志书续修断想》、李明的《续“志”工程启动前的三个问题》、吴忠礼的《新志续修的总体要求》、左开一的《新志续修的断限及操作》。因为缺乏经费，此书未能公开出版，只是内部印刷数百册，寄发各地供参考。在此期间，华夏地方志研究所还曾编写出版了《汉正街志》，记述歌颂改革开放。

华夏地方志研究所在完成历史任务后，终因经费拮据，负责人精力不济，这才把研究所的活动停止下来。虽说华夏地方志研究所坚持不足10年，不过是昙花一现，但它却充分体现了“有志于此者”们以事业为重、主动担当的精神。有时我想将来若编写中国方志发展史，应对在方志园地不计报酬、默默耕耘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员和民间方志研究所留下一笔。

以修志为乐 以修志为荣

2000年6月我退休后，正遇上二轮修志的历史机遇，决心发挥余热，去体会一下“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情怀。在退休后的20年中，我一直风雨兼程参编方志，在探索的道路上寻求人生的快乐。所以，“以修志为乐，以修志为荣”便是我晚年生活的写照。

2000年春，安徽有位省级老领导找上我，说广东友人托他在皖聘人去深圳担任《万丰村志》主编。万丰村是当时全国十大名村之一，有所谓“北有大邱庄，南有万丰村”之说，那时他们正在践行“共有制”^①。由于此前我曾在安徽省志办工作过10个年头，又是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首批公布的学术委员，一轮修志被江西省14个市县聘为修志顾问，退休后去编一部村志应当不会有多少困难。6月6日，我从省政协机关办了退休手续，立即直飞深圳，头尾用了一年时间，完成80余万字的《万丰村志》（稿），后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受到社会广泛好评。一度深圳报刊谈及深圳历史变迁时，常常引用《万丰村志》的资料。完成村志后，我以《村镇志研究》为题，撰写了一篇论文，刊发于《上海志鉴》第二期，指出“村镇志的编纂是富有发展前景的新领域”。

2001年，回到合肥，安徽省志办约我参编《安徽省志简本》，是志150万字，分工我承编经济部类50万字，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两年奋战我便按时交稿。省志办领导又提出请我审稿。虽说这段时间日以继夜查阅资料，不断拟稿、改稿和审稿，但心情愉快，诗云“旧友新朋续志日，前度刘郎喜又来”。

2004年春，义乌市志编辑部的主编、编委一行4人，驱车前来合肥，邀我去义乌担任特约编辑，参编《义乌市志》，当时给我明确三项任务：（1）帮助修改义乌市志篇目；（2）全程业务指导；（3）协助总纂。《义乌市志》系中指组二轮修志抓的点，为了使《义乌市志》成为新志中佳本，我付出了极大的辛劳，4年中仅平时业务指导撰写的文字就达120余篇，合订成5本小册子。在参编《义乌市志》的过程中，我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实践自己对新方志编纂的一些设想，收获颇多。

《义乌市志》是《义乌县志》的续志，体例如何安排？我认为续志不是什么“断代志”，它是承接前志所编的新志，既要续新，又要续旧，否则就称不上是“一方之全史”。为此，我提出在市志的卷首增设“义乌史略”，简要地记述有史以来至续志上限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历史，市志的其他部类——各类专志则主要记述断限之内的史实，全书形成“纵述历史，横陈现状”。我所以产生如此设想，主要是受到《台湾通志稿》《紫阳县志》以及《德国概况》三书的启发。

《义乌史略》把义乌发展划为6个时期：置县前的历史线索、秦汉至五代十国、宋元时期、明清时期、中华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截至到撤县建市）。每个历史时期选择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加以记述，这样做既可使人们对重大事件保持清醒的回忆，又可以从淹年岁远的陈迹中，寻求指导现实生活智慧和力量，既把现在和过去联结起来，又把新志和旧志联结起来。由于卷首载有“史略”，新志的开篇便改为“建置·环境·人口篇”，从而面貌一新，使志书更加适应新时期新读者的需求。

2007年，在基本完成《义乌市志》参编任务后，我逐步把参编活动转移到《合肥市志》上。始为顾问，后为总纂。为了在续志中保留更多一点本市的文脉和史脉，使新志适量回归文化之志，我提出“激活丛谈”。“丛谈”本身就是传统志书的一个门类。“合肥丛谈”选择了合肥

^① 万丰人认为自己践行的既不是公有制，也不是私有制，而是“共有制”。

历史上5位代表人物：杨行密、包拯、李鸿章、刘铭传、段祺瑞的事迹，组成5个专题：（1）吴王事略；（2）包公文化；（3）李鸿章与淮军创建；（4）刘铭传轶事；（5）段祺瑞纪闻。起到补前志记述不足，彰显合肥文化精神，存地方史研究之成果的作用，从而放大志书存史、资治、教化之功能。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正确的道路是这样，汲取你的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激活“丛谈”的实践，使我深切地体会到传统中有很好的东西，但这些好的东西需要现代社会重新激活，经由传统实现创新也是一条值得思考的路子。作为总纂，对《合肥市志》在省会城市中率先出版，自然十分高兴，故作小诗记之：大湖名市志已成，梳理文献责非轻。三十一家列首部，经由传统蕴创新。

这20年来，我是一部志书一部志书的参编，像游僧那样东奔西走，像苦役犯那样埋头劳作，据统计一共参编26本新志，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然而这一切都是事实。我从不做挂名顾问、挂名主编、挂名总纂，除以上列举的《万丰村志》《义乌市志》《合肥市志》《安徽省志简本》4部参编代表作外，深度参编的还有《庐阳区志》《凤阳县志》《砀山县志》《苏埠镇志》《常营回族乡志》^①《宣笔志》《中国民主建国会合肥市地方组织志》等。在参编新志的同时，我还应聘点校出版了两本旧志，即明代《凤阳新书》和民国初年《芜湖县志》。由于活动量大，认识的志友也多，无论走到哪里都获得志友们欢迎，省志办领导对我亦尊重有加。2018年3月25日《合肥晚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我退休后参编方志的事迹，题为《呕心为修志，沥血著春秋》。更使我感动的是，中指组办公室领导从不把我当外人，不仅多次通知我参加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还吸收我参编《当代志书编纂教程》，并聘任我为《方志百科全书》的专家组成员。2019年，中指组在《关于全国地方志先进典型的通报》中，把我列入了表彰名单。

而今，我已进入耄耋之年，心里依然牵挂着为之呐喊、为之奋斗、为之流泪的方志事业。回首往事，总觉得对方志界存有一股感恩之情，感恩已故的方志界老领导、老专家，老朋友，他们教我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使我终身受益。感恩新方志事业，它使我退休生活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更有尊严，而且颇有成就感。

（作者单位：安徽省政协）

本文责编：杨卓轩

^① 常营回族乡隶属北京市朝阳区。